

北魏政治史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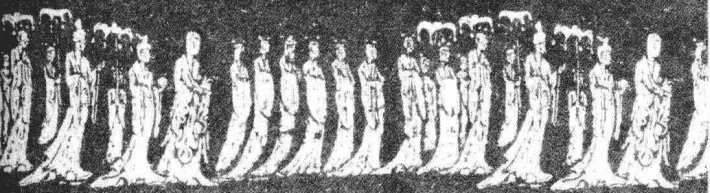
BEIWEI ZHENGZHISHI

张金龙 著

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曰
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赏
凡为人君忠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
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
直书时事元法国恶人君威福自己
史复不书将何所惧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教育出版社



BEIWEI ZHENGZHISHI

张金龙 著



北魏

政治史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魏政治史. 六/张金龙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423-1799-5

I. 北… II. 张… III. 政治制度—历史—研究—中国—
北魏(439~534) IV.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第072405号

责任编辑: 金海峰

封面设计: 徐晋林

北魏政治史 六

张金龙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31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7.5 插页4 字数350千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23-1799-5 定价:55.00 元



第八卷 孝文帝时代(476—499)	
上:内政、战争与外交	1
第一章 冯太后第二次临朝听政	8
一、冯太后对政敌的打击	8
二、冯太后的统治集团	18
1.最高决策集团	18
2.统治集团其他重要成员	25
三、对统治集团成员的笼络	32
四、巩固权力的几项举措	36
1.立燕宣王庙、碑,确立家族地位	36
2.联姻皇室,确保家族荣显	39
3.颁布《皇诰》,确定统治原则	43
第二章 孝文帝身世与其听政时间	52
一、孝文帝身世与其民族成分	52
二、孝文帝开始听政的时间	65
1.孝文帝听政始于冯太后在世之时	65
2.太和十年前孝文帝已开始听政	72
3.太和十年后孝文帝已独立听政	76
4.冯太后与孝文帝一起决策国政	82
第三章 太和十年前(476—485)的内政	91

一、求言纳谏	91
二、赦与法	93
1.大赦与曲赦	93
2.刑法	95
三、农业与赈济	97
1.重视农业生产	97
2.户籍与奴隶制	102
3.灾荒赈济	104
4.养老尊老	108
四、行幸活动与土木工程	109
1.冯太后、孝文帝的行幸活动	109
2.土木兴建	115
五、反叛活动	119
1.沙门法秀谋反	119
2.地方反叛活动	125
第四章 太和十年后（486—499）的内政	130
一、赦与法	130
1.大赦与曲赦	130
2.慎刑法	131
3.听讼录囚	132
二、农业与赈济	136
1.农业	136
2.灾荒赈济	137
3.置常平仓	143
4.尊老养老	147
三、遣使巡察与地方治理	150
1.遣使巡察	150
2.地方治理	153

3. 边地戍卒状况	162
四、孝文帝与佛教	165
五、反叛活动	182
第五章 南北边境冲突与孝文帝第一次南伐	194
一、479—481 年的南北边境冲突	194
二、481—493 年的南北媾和与小规模冲突	213
三、孝文帝第一次南伐	219
1. 南伐的准备	219
2. 南伐的概况	227
3. 东路军：进攻义阳	232
4. 西路军：进攻南郑	236
5. 孝文帝亲征的行程	243
6. 赭阳之役	256
第六章 孝文帝第二、三次南伐	261
一、孝文帝第二次南伐	261
1. 南伐的概况	261
2. 占领沔北诸郡	274
3. 义阳之役	283
4. 涡阳之争	288
二、孝文帝第三次南伐	297
1. 南齐陈显达北伐	297
2. 孝文帝亲征与病逝	302
第七章 孝文帝时期北魏的西南经略	311
一、南齐初年荆楚局势与氐人动向	312
二、北魏对西南氐族地区的经略	319
三、南北朝政权与宕昌羌族	330
第八章 孝文帝时期北魏与南齐的通使	333
一、宋齐易代与南北朝外交新局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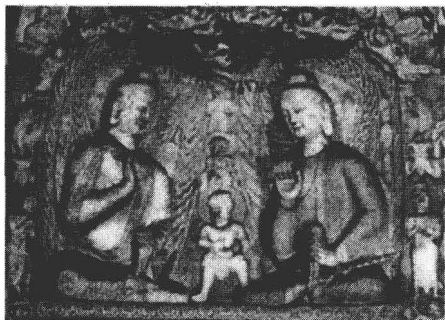
二、太和十年后（486—494）的南北通使	344
三、南北政权的外交代表： 使节的选用及其在出使国的活动	350
1.使节的选用	350
2.使节的接待及其在出使国的活动	356
四、北魏接待南齐使节的官职：主客之职	367
1.概况	367
2.沿革与职掌	370
3.人选及任职条件	375
第九章 孝文帝时期其他国家向北魏的遣使	385
一、概况	385
1.太和十年之前（476—485）	385
2.太和十年以后（486—499）	388
二、高丽暨东北亚国家	393
1.高丽（百济附）	393
2.其他东北亚国家	400
三、柔然与高车	404
1.柔然	404
2.高车	407
四、吐谷浑与西南氏羌政权	410
1.吐谷浑	410
2.西南氏羌政权	414
五、西域国家	422
参考文献	425

第八卷

孝文帝时代(上)

(476—499)

上：内政、战争与外交



云冈石窟第9窟释迦、多宝对座像(局部) ①



云冈石窟第17窟小龕太和十三年
(489)造像(局部) ②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①）

① 云冈石窟中的双窟（第6—10窟）及大量的二佛并座图像，被认为体现了孝文帝与冯太后“二圣”共政的特殊政治背景。参见：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论》，《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9页；殷宪，《云冈石窟所反映的一些北魏政治社会情状》，同主编《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84—486页；王建舜，《论云冈石窟双窟的概念及特征》，同上，第533—545页；张艳，《云冈石窟中的二佛并座和文殊问疾》，《文物世界》2005年第4期。

② 按此为云冈石窟仅有的两个纪年窟龕之一（另一为太和七年），时当冯太后晚年，二佛同座雕像可能反映了冯太后与孝文帝的形象。

③ 按《魏书》卷一三原文已佚，后人据《北史》等所补，但其基本史源仍为《魏书》。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礼，常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南北征巡，有司奏请治道，帝曰：“粗修桥梁，通輿马便止，不须去草划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为之，不为不急之事损民力也。巡幸淮南，如在内地，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直，民稻粟无所伤践。诸有禁忌禳厌之方非典籍所载者，一皆除罢。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待纳朝贤，随才轻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迈，不以世务婴心。又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岁，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性俭素，常服汗濯之衣，鞍勒铁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类也。（《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①）

高祖孝文帝元（拓跋）宏（467—499），公元471—499年在位，北魏王朝第六代君主。元宏为献文帝长子，其母李夫人（追谥思皇后）为南郡王李惠之女，中山安喜人。孝文帝于“皇兴元年（467）八月戊申（廿九，10.13），生于平城紫宫”；“三年夏六月辛未（初三，6.27），立为皇太子”，其母李氏依旧制被赐

^① 按此段文字当为孝文帝时代高闾、李彪所撰北魏国史之“史臣曰”。

死。元宏于皇兴“五年秋八月丙午（二十，9.20），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丙午朔（初一，4.26），孝文帝在南征途中“崩于谷塘原之行宫”；五月丙申（廿一，6.15），安葬于洛阳北郊邙山的长陵。^①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移到洛阳，他是第一位葬于洛阳的北魏皇帝^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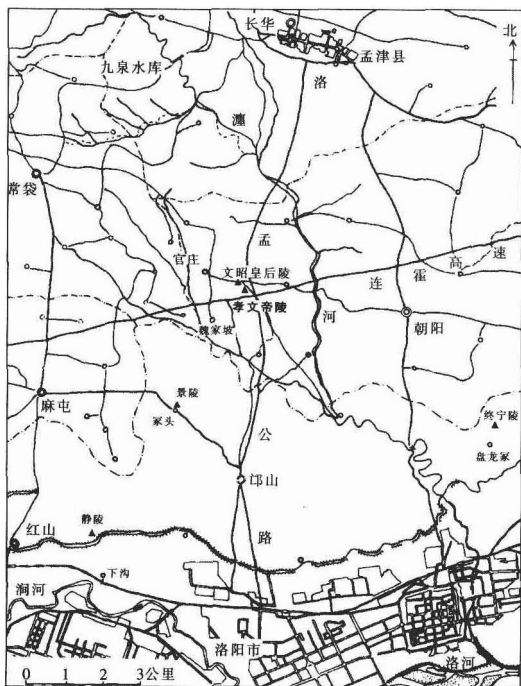
孝文帝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汉族，史称其“生而洁白，有异姿，襁褓岐嶷，长而渊裕仁孝，绰然有君人之表”云云^③。此虽

① 参见：《魏书》卷六《显祖纪》，卷七上《高祖纪上》，卷七下《高祖纪下》，卷一三《皇后·献文思皇后李氏传》。按北魏天安元年（466）五月五日《曹天度造石塔题名》谓“愿圣主契齐乾坤，德隆运表，皇太后、皇太子延祚无穷”云云。史树青认为：“圣主即献文帝拓跋弘”，“皇太后即高宗文成帝拓跋浚后——冯太后”，“皇太子当指献文帝子拓跋宏，即孝文帝元宏”。因史载孝文帝生于皇兴元年（467）八月，故他提出“疑《魏书》、《北史》所记元宏生年有误”。（《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物》1980年第1期）按天安元年五月北魏朝廷并无皇太子，因为孝文帝被立为皇太子是在皇兴三年六月，即便史书所载孝文帝生年有误，天安元年五月孝文帝已出生，他也并非皇太子。胡顺利认为：“根据题铭拓片上残存字迹，‘皇太子’似为‘皇太妃’，‘妃’字似误释为‘子’。”“‘皇太后、皇太妃’下漫漶的两个字，应释为‘诞育’，而不是‘延祚’。”（《谈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题名释文》，《文物》1983年第7期）这一看法应该是准确的，史书所载孝文帝生年不存在问题。

② 孝文帝“长陵位于孟津县朝阳乡官庄村东约0.8公里，地处洛阳市北部的邙山之巔，灤河的西岸，距灤河河道直线距离约1.8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12°25.12′，北纬34°45.96′”。“陵园坐落在一个大致东南—西北向的黄土山梁上，中部高隆，四周低矮。地势宽阔明亮，起伏平缓，海拔高度270~277.5米。小区域内地形完整，鲜见大型的黄土沟坎。”“根据钻探、调查和解剖的情况来看，长陵陵园平面近方形，东西长443、南北宽390米，面积17万余平方米。陵园四周构筑有夯土垣墙，垣墙外侧挖建壕沟，垣墙的正中开设陵门。”“垣墙宽2~3.8”米，“垣壕与垣墙相距0.5~3米，断面为梯形，宽2~4、深0.2~1.8米。”（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探》项目工作报告，《文物》2005年第7期）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不无夸诞附会之嫌，但似乎可以看出两位李氏的遗传基因对孝文帝身心的影响。加之他从幼年时期起所受到的完全是纯粹的汉文化教育，因而具备了良好的汉族传统文化素养。孝文帝虽然在公元471年即位，但471—476年仍由其父拓跋弘以太上皇身份执掌大政，476年太上皇死后由太皇太后冯氏（文明太后）临朝听政，后来则由孝文帝与冯太后共同决策国政，故本



孝文帝长陵位置示意图

书以476—499年作为孝文帝时代。下篇专论孝文帝时代的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上篇则对改革以外的内政以及南北战争和外交关系进行考察。

献文帝被害后冯太后开始了她的第二次临朝听政，这是冯太后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均田制、三长制等重要制度改革都是在冯太后在世时颁布的，它们究竟是由冯太后独立决策，还是她与孝文帝共同决策的？占优势的传统观点认为，孝文帝与这些改革措施无关，甚至认为冯太后在世时孝文帝完全不参与朝政。从史书记载来看，冯太后在世时孝文帝已经开始参与国政，太和十年后更是作为最高统治者执掌大政，当然并不排除冯太后在特定情况下仍会参决国政。迁都以后孝文帝致力于南伐战争，他曾经三次御驾亲征，这是北魏与南朝之间大规模战争停止近三十年之后的新一轮战

争，自此直至北魏灭亡持续达三十余年。在这三十余年时间里，南北朝之间陷入敌对状态，在南北边境的各条战线相继爆发了激烈的对峙和军事冲突，这成为北魏后期政治生活最主要的重心之一。孝文帝的南伐成果集中体现在攻占南齐沔北五郡，从而为新都洛阳的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从太和七年（483）以后北魏进入改革时代，改革无疑是此后近二十年间北魏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不过孝文帝时代的政治史不仅仅包括改革，同时还有其他的统治问题和统治政策需要了解，本卷将对孝文帝时期改革以外的内政及当时的外交关系进行考察。北魏在迁都之前与南齐之间出现了一段颇为密切的通使关系，对于认识北魏外交以及南北关系具有典型意义。^①

① 有关北魏孝文帝及冯太后的概述和专题研究甚多，兹列举部分论著：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第504—528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下册，第526—556页；何兹全，《北魏文明太后》，《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5—241页；孙同勋，《孝文帝的迁都与汉化》，《拓拔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49—154页；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乡出版社，1995年，第113—164、178—206页；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7—219页；同上，《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2003年，第71—103页；肖黎，《北魏改革家——孝文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精诚，《魏孝文帝传》，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日〕大澤陽典，《馮后とその時代——北魏政治史之一齣》，《立命館文学》第192号（1961）；〔日〕田村實造，《北魏孝文帝の政治》，《東洋史研究》第41卷第3号（1982），收入同氏《中國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會》，創文社，1985年，第249—279页；〔日〕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書院，1998年，第189—340页；〔韩〕金聖熙，《北魏文明太后的时代——以政治势力间的对立状况为中心》，《魏晋隋唐史研究》（2001）。

第一章

冯太后第二次临朝听政

一、冯太后对政敌的打击

公元476年六月发生了北魏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即献文帝被害与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承明元年^①）六月甲子（初六，7.13），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

辛未（十三，7.20），太上皇帝崩。

壬申（十四，7.21），大赦，改年。大司马、大将军、安城王万安国坐矫诏杀神部长奚买奴于苑中，赐死。

戊寅（二十，7.27），征西大将军安乐王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南平公目辰为司徒，进封宜都王，南部尚书李诜为司空；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

^① 按当时尚未改年，故应为延兴六年。

按“中外”是指宫城内外即京师，从“分京师见兵为三等”云云亦可证^①。关于延兴六年六月初六北魏朝廷颁布的戒严令，具体内涵今已难明究竟，有人认为是冯太后与太上皇争夺最高统治权而采取的措施，即他们通过军事较量的方式以决胜负。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还专门对宫廷政变说进行了考辨。如果确实是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而进行的军事较量，那么谁是戒严令的发布者？若是太上皇拓跋弘，为何后来死的是他？若是皇太后冯氏，在太上皇决策国政的情况下她是如何能够调动“京师见兵”的？献文帝受“鸩毒之祸”而“暴崩”之说又当如何理解？从北魏历史上来看，戒严一般都是在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前夕实施的，目的是对出征大军进行部署；此外，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时实施戒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延兴六年六月初六北魏朝廷颁布戒严令，不外乎三种可能：（1）戒严令是由太上皇发布的，他是想通过京师戒严清除异己，巩固现有权力；（2）戒严令是由冯太后以孝文帝名义发布的，她是想通过调动京师驻军的方式从太上皇手中夺回临朝听政之权；（3）戒严令是北魏朝廷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或校猎活动时颁布的。从“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的具体情况来看，似乎第三种可能性更大。考察《宋书》卷一四《礼志一》、《隋书》卷八《礼

^① 按“中外”并非全国各地，若是全国各地则当以“天下”称，当时绝对没有采取全国戒严的必要，而且也是不现实的。

仪志一》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礼仪的记载^①，可知在京师实施

①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

兵者，守国之备。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凶事，不可空设，因蒐狩而习之。而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战陈之事。……（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今兵革未偃，士民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

本卷记载了魏晋及刘宋的“治兵”（大习众军、戏兵、阅习、讲武、大蒐、校猎），特别是对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闰二月“大蒐于宣武场”的仪式（校猎仪）有详细具体的记载。这种校猎活动实际上就是军事演习，以禁卫军为主体的京师驻军几乎都要全体出动，举行校猎仪式时要进行戒严，即校猎开始前戒严，结束后解严。《隋书》卷八《礼仪志一》：

古者三年练兵，入而振旅，至于春秋搜猕，亦以讲其事焉。梁、陈时，依宋元嘉二十五年搜宣武场。其法，置行军殿于幕府山南冈，并设王公百官幕。先猎一日，遣马骑布围。右领军将军督右，左领军将军督左，大司马董正诸军。猎日，侍中三奏，一奏捷一鼓为严，三严讫，引仗为小驾鹵簿。皇帝乘马戎服，从者悉绋衫帻，黄麾警蹕，鼓吹如常仪。猎讫，宴会享劳，比较多少。戮一人以惩乱法。会毕，还官。

后齐常以季秋，皇帝讲武于都外。有司先莱野为场，为二军进止之节。又别埤于北场，舆驾停观。遂命将简士教众，为战阵之法。……前五日，皆请兵严于场所，依方色建旗为和门。都埤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应讲武者，各集于其军。戒鼓一通，军士皆严备。二通，将士贯甲。三通，步军各为直阵以相俟。大将各处军中，立旗鼓下。有司陈小驾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辂，大司马介冑乘，牵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军迭为客主。先举为客，后举为主。从五行相胜法，为阵以应之。

……河清中定令，每岁十二月半后讲武，至晦逐除。二军兵马，右入千秋门，左入万岁门，并至永巷南下，至昭阳殿北，二军交。一军从西上合，一军从东上合，并从端门南，出阊阖门前桥南，戏射并讫，送至城南郭外罢。

本卷还记载了“后齐春蒐礼”，又谓“夏苗、秋猕、冬狩，礼皆同”。对于“后齐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舆，诣射所”相关礼仪有具体记载，后周仲春教振旅、孟秋迎太白之礼亦有所记载，而隋制则是“军人每年孟秋阅戎具，仲冬教战法”。